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試評英美七〇年代以來地景研究和理論發展的主要趨勢

A Critique of Main Theoretical Trends of Landscape Research in Britain and the U.S. since the 1970s

doi:10.6154/JBP.1989.4.010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4), 1989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4), 1989

作者/Author：蔡厚男(Hou-Nan Tsai)

頁數/Page：149-15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9/0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1989.4.01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試評英美七〇年代以來地景研究和理論發展的主要趨勢

蔡厚男*

A Critique of Main Theoretical Trends of Landscape Research in Britain and the U.S. since the 1970s

by

Hou-Nan Tsai*

摘 要

本文旨在將七〇年代以來，英美關乎地景研究的成果，按其理論構成的類型劃分成：一、視覺美學的地景知覺，二、新人文主義的地景（地點），三、地景歷史論述，四、地景的意識形態分析，並且針對這些論述在認識論上對形式與價值、主體與客體、個體與集體之間二元對立和統一的種種預設加以批判，以表白各類論述的意識形態覆蓋。

ABSTRACT

This essay is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current landscape research in Britain and the U.S. since 1970s, which classified into four theoretical typologies as following: visual aesthetics of landscape perception, humanistic landscape (or place), landscape history discourse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of landscape. The critique examines the problematic concerning the dual and uni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e and form, subject and object,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and then uncovers the ideology of these discourses.

民國77年 8月27日收稿

*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Manuscript received on August 27, 1988.

* Doctoral Program, Graduate 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主要書評目錄

1. Appleton, Jay, 1975/1977/1978, Th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pp.293.
2. Gold, John R. & Jacquelin Burgess(ed) 1982, Valued Environment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p.206.
3. Meining, O.W.(ed.), 1979,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Geographical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55.
4. Relph, Edward, 1981, Rational Landscapes and Humanistic Geography, London: Croom Helm, pp.231.
5. Fisher, Irving D. 1976/1986, Frederick Law Olmsted and the City Planning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UMI Research Press, Ann Arbor, MI, pp.205.
6. Cranz, Galen, 1982, The Politics of Park Design: A History of Urban Parks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pp.347.
7. Williams, Raymond, 1973,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35.
8. Cosgrove, Denis E. 1984,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London: Croom Helm, pp.293.

地景給人們的一般印象，是一個吸引人們的、有意義的與曖昧模糊的感性物。地景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它能使吾人聯想到自然景緻視野裡愉悅的意象。地景其廣泛多重的意涵則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對各種文化產物或生活空間中之地景表徵的審美價值與象徵意義的不同詮釋所形成的。至於始終捉摸不住，無法釐清的地景觀念，其實是主要導源於前後介入之所謂“科學的”或“藝術的”或“專業的”論述，在認識論上對形式與價值，主體與客體，個體與集體之間種種關乎知識形成的基本架構之預設，各說各話，長久累積造成的一個結果。是故，地景理論之建構，其首要工作即在於表白各式論述的意識形態覆蓋。

雖然當代地景的觀念，由於十九世紀如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等欲寄寓的道德和社會意涵，在工業資本主義的摧殘下逐漸地萎頹，不再成為進步的意識形態，甚至是被資本主義與後資本主義社會逐出人文歷史的核心(Cosgrove, 1984: 254-271)。但是，由於地景觀念形成過程中所帶有的意識形態性格，它與「自然」、「環境」有極親近又曖昧的聯想關係，甚至曾經一度成為可以互換使用的範疇，因而在七〇年代以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空間基礎之論述中，做為支配性的技術理性控制論述之相對體，強調人性關係經理所浮現的人文主義論述之一部份而重獲重視(Scott, 1982)。這個歷史與理論的時勢

，造成了英美地區關乎地景的學術研究和專業實踐蓬勃和嶄新的再出發。

首先是視覺美學的地景研究。由於七〇年代以來，環境政策議題的提出，社會大眾對資源保育及經理的呼籲，以及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代理人在資源利用及分派上日增的職責(Zube, 1980)，地景研究又成為地理學者、環境規劃設計專業及環境政策制訂者等關切的一重要領域。特別是因應技術理性，為緩和資本主義社會建制危機而設計出來的策略，如環境影響評估制度，要求重大開發行為對非實體的適意資源(Amenity Resource)納入整體環境評估系統之中，於是著眼於實務與經理的地景知覺(Landscape Perception)分析與評估一時羣起，尤其是在講究制度再生產、服務與效率的實用主義哲學傳統下的美國，更是頓時成為此類研究的大本營。十多年來儘管在量上有可觀的拓張(其中較具代表性者，如Zube, Brush & Fabos, 1975; USDA, Forest Service, 1973-1978; USDI, BLM, 1980a; Elsner & Smardon, 1979)，但這些研究始終忽略一般性的理論架構、基礎的理論構造，以提供不同社會文化條件下，地景開發症候的診斷分析知識，故在理論層次談不上突破性的成就。

按祖比，傑斯與泰勒(Zube, James & Taylor, 1982)等綜括此類地景知覺研究文獻，以“人-地景-互動-座出模型”(Human-Landscape-Interaction-Outcome-Mode)歸納劃分成專家、精神物理、認知與經驗四種類型，其實深究此分析的理論預設，完全是心理學界行為主義(Behaviorism)論述的產物，他們主要關切觀察者對來自於實質環境之刺激的知覺(尤其是視覺上)反應，大量仰賴實驗心理等的實證研究方法及訊息處理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將人們的整體環境經驗及價值化約成為一系列連續的步驟及部份要素，個別地處理事物是如何地被看，環境刺激形成的反應訊息是如何地被收集、傳譯與理解，進而研判這些部份要素如何地依序去影響人們的態度、偏好與行為；不錯，這類研究方法的確確認了局外觀察者對地景知覺所產生的工具意義，這種實證主義的認識論性格，迎合了所謂環境評估系統的操作要件。然而，不可諱言地，他們卻簡化了主體做為人存在的經驗，集體使用與改變地景行動深處關乎整體性的範疇，可說是完全割裂了人與地景，割裂了地景中人們與其社會歷史的連結關係。

在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下，傑·愛坡頓(Jay Appleton, 1975)的努力是另一種經過修飾的解釋。鑒於被異化的地景知覺與理論的貧乏，英國人文地理學者愛坡頓首先重新來省察地景的美學品質，直接質問：“吾人究竟喜歡地景的什麼？為什麼我們會喜歡它呢？”他企圖去尋找一種審美哲學，不但能從一般抽象概念的角度，建立一個

地景知覺的理論基礎，而且亦可在實踐應用的層次，進行地景分析比較的研究；他用Habitat Theory與Prospect-Refuge Theory這兩個假設，分別處理吾人對適合生物生存之環境條件的愉悅反應，與解釋此種令人喜愛讚美的反應，極力為有意識的主體與可見的自然環境景緻之間感情連續的本質與源起做理論上的辯護。進一步而言，愛坡頓論述的疑旨乃在於探索美好的地景經驗與生物求生存本能之間存在一種對應平行的和諧關係。在概念上，其人類的地景經驗是預設在個體對個別的自然景緻之直接反應經驗與知覺的基礎上，美好地景產生的愉悅感，係源於觀察者體驗到一個環境，極能適合其生物性需求的滿足感，故而策略上將此類地景評估成為“潛性的棲息地”(Potential Habitats)。

但問題是人們與外在世界的感情連結，根本不可能只是個體或單獨個別的事件，而是關乎社會的意義，對生活於地景中的存在主體而言，主體與客體之間不宜做靜態而機械的分界，他們與外在世界的審美關係，需要進一步探索其歷史文化累積的審美傳統與人類集體求生存的自然基礎，所以當愛坡頓將地景經驗視為一個局外個體感知的存在時，必然地會遺落局內主體參與的共同經驗，尤其是愛坡頓亦從實用的觀點去分析地景的形式結構，著力於討論戶外視景之構圖表現方式。這樣的處理做法只是更無法說服吾人相信他對形式表徵下的深層意義和象徵的詮釋，究竟與他原先提出的兩種假說有何內在的關聯！總而言之，愛坡頓的地景知覺理論不過是十八世紀英國主觀唯心論傳統下的審美心理哲學重新披掛上陣。其最明顯的一個特點就是感覺主義，客體化的地景在此只是外在主體感覺的複合或組合，地景形式的審美價值，總是取決於個體感性經驗的範圍內，地景審美經驗與生物求生存間的因果詮釋觀念，均無關乎具體實踐的過程與社會整體的行動意義。因此，與其說愛坡頓開拓了地景知覺的理論研究，倒不如看成他的理論為前述的地景知覺研究下了一個註腳。

其次是人文地理學界的地景研究。從十九世紀的地理學建制化成為當代學院的論述以來，地景一詞就是地理學文獻裡經常出現的一個重要術語，但長期受到科學主義的客觀及理性的支配，地景在地理學界始終被當作一個靜態的、科學探討所決定的客體，像是三〇至五〇年代期間流行的形態學方法(Morphology Method)，被認為可以客觀地確認、分類與度量地景的構成要素以及處理其元素間形式組合的關係。六〇年代，實證主義的地理學甚至基於客觀和理性分析的旨趣，完全排斥感性參與的主體性(Subjectivity)(James, 1972)。直到七〇年代，實證主義的觀點才逐漸地受新人文主義地學思潮的挑戰(Tuan, 1971; Gregory, 1978; Ley & Samuels, 1978)。關乎地景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大體上均朝向主體性的重建，

試圖以一種人文取向去理解人及其生活世界的感性關係。譬如段義甫(Tuan, p.265)替人文主義地理學辯論：“藉著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這些有關空間與地點的地理行為，感情與觀念，吾人才能理解人文的世界。”

但是在對地景觀點的預設與研究方法上，英美兩地學術傳統的差異，從葛德與伯吉斯(Gold & Burgess, 1982)曼寧(Meining, 1978)，傑克生(Jackson, 1970, 1980, 1984)及雷佛(Relph, 1976, 1981)等論文邏輯可以看到其在風格與焦點上的一些差異。

在英國由於豐碩的歷史地景遺產，學界對地景的研究可謂既早又雜，以愛坡頓為首，成員來自英美各大學所組成的地景研究團體(Landscape Research Group, 簡稱LRG)，或許就是當今世界唯一從各種觀點研究地景的組織(Penning-Rowsell & Lowenthal, 1986)。不過，1978年英國地理學家協會(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在胡爾大學(Hull University)舉辦年會，並以“賦有價值的環境”(Valued Environments)做為研討會主題，集中討論個人及團體生活中地點及地景的意義；由於研討論文作者清一色為英國年輕一輩的地理學者，故葛德與伯吉斯(1982)的論文選輯足堪代表對新生代地理思潮在地景研究與理論發展的標竿。

主編使用“賦有價值的環境”這麼一個深具想像力的標題替代場所及地景，一方面可以避開傳統不同學域，像是環境心理學、社會地理學、地景分析與評估……等可能造成的先入之見，另一方面則可強調人與其所創造、居住、操控、保存、尋訪甚至想像的環境之間的感情連繫，說明他們重視各種實質地景及地點中人們的主觀經驗、意義與價值的探索。

在研究方法及技巧上，葛德與伯吉斯(1982: 3-4)開始就質疑往昔常用的行為及社會科學調查法，譬如：問卷、量表測驗、地景調查分析、照片模擬反應……等無法有效地表達與傳譯人們的地點感，故而建議利用文學材料的詮釋、史料的解釋佐證、對話、訪談、問卷數據、學院式的討論激盪等方式，來展現各式各樣的地點經驗及意義；因此，論文邏輯中有布蘭·古迪(Brian Goredy)著重地點感覺品質的傳譯方法策略；有賈桂林·伯吉斯(Gacquelin Burgess)對以往電視評論員視覺解說方式的反省後，所提供另一種解說記錄模式的經驗心得，有大衛·勞思索(David Lowenthal)藉助文學材料勾勒重訪地點的經驗。在地景價值與權力實踐的關係討論方面，梅林·蕭德(Marion Shoard)從人文的角度側寫五位荒地保育者的觀點及其精英品味，是如何地影響形成全國性保育政策的取向，進而表白英國荒地景觀之獨特魅力的謎底；史第芬·丹尼斯(Stephin Daniels)及韓福瑞·雷帕(Humphrey Repton)的作品來討論英國喬治亞

主要書評目錄

1. Appleton, Jay, 1975/1977/1978, Th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pp.293.
2. Gold, John R. & Jacquelin Burgess(ed) 1982, Valued Environment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p.206.
3. Meining, O.W.(ed.), 1979,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Geographical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55.
4. Relph, Edward, 1981, Rational Landscapes and Humanistic Geography, London: Croom Helm, pp.231.
5. Fisher, Irving D. 1976/1986, Frederick Law Olmsted and the City Planning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UMI Research Press, Ann Arbor, MI, pp.205.
6. Cranz, Galen, 1982, The Politics of Park Design: A History of Urban Parks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pp.347.
7. Williams, Raymond, 1973,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35.
8. Cosgrove, Denis E. 1984,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London: Croom Helm, pp.293.

地景給人們的一般印象，是一個吸引人們的、有意義的與曖昧模糊的感性物。地景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它能使吾人聯想到自然景緻視野裡愉悅的意象。地景其廣泛多重的意涵則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對各種文化產物或生活空間中之地景表徵的審美價值與象徵意義的不同詮釋所形成的。至於始終捉摸不住，無法釐清的地景觀念，其實是主要導源於前後介入之所謂“科學的”或“藝術的”或“專業的”論述，在認識論上對形式與價值，主體與客體，個體與集體之間種種關乎知識形成的基本架構之預設，各說各話，長久累積造成的一個結果。是故，地景理論之建構，其首要工作即在於表白各式論述的意識形態覆蓋。

雖然當代地景的觀念，由於十九世紀如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等欲寄寓的道德和社會意涵，在工業資本主義的摧殘下逐漸地萎頹，不再成為進步的意識形態，甚至是被資本主義與後資本主義社會逐出人文歷史的核心(Cosgrove, 1984: 254-271)。但是，由於地景觀念形成過程中所帶有的意識形態性格，它與「自然」、「環境」有極親近又曖昧的聯想關係，甚至曾經一度成為可以互換使用的範疇，因而在七〇年代以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空間基礎之論述中，做為支配性的技術理性控制論述之相對體，強調人性關係經理所浮現的人文主義論述之一部份而重獲重視(Scott, 1982)。這個歷史與理論的時勢

，造成了英美地區關乎地景的學術研究和專業實踐蓬勃和嶄新的再出發。

首先是視覺美學的地景研究。由於七〇年代以來，環境政策議題的提出，社會大眾對資源保育及經理的呼籲，以及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代理人在資源利用及分派上日增的職責(Zube, 1980)，地景研究又成為地理學者、環境規劃設計專業及環境政策制訂者等關切的一重要領域。特別是因應技術理性，為緩和資本主義社會建制危機而設計出來的策略，如環境影響評估制度，要求重大開發行為對非實體的適意資源(Amenity Resource)納入整體環境評估系統之中，於是著眼於實務與經理的地景知覺(Landscape Perception)分析與評估一時羣起，尤其是在講究制度再生產、服務與效率的實用主義哲學傳統下的美國，更是頓時成為此類研究的大本營。十多年來儘管在量上有可觀的拓張(其中較具代表性者，如Zube, Brush & Fabos, 1975; USDA, Forest Service, 1973-1978; USDI, BLM, 1980a; Elsner & Smardon, 1979)，但這些研究始終忽略一般性的理論架構、基礎的理論構造，以提供不同社會文化條件下，地景開發症候的診斷分析知識，故在理論層次談不上突破性的成就。

按祖比、傑斯與泰勒(Zube, James & Taylor, 1982)等綜括此類地景知覺研究文獻，以“人-地景-互動-座出模型”(Human-Landscape-Interaction-Outcome-Mode)歸納劃分成專家、精神物理、認知與經驗四種類型，其實深究此分析的理論預設，完全是心理學界行為主義(Behaviorism)論述的產物，他們主要關切觀察者對來自於實質環境之刺激的知覺(尤其是視覺上)反應，大量仰賴實驗心理學的實證研究法及訊息處理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將人們的整體環境經驗及價值化約成為一系列連續的步驟及部份要素，個別地處理事物是如何地被看，環境刺激形成的反應訊息是如何地被收集、傳譯與理解，進而研判這些部份要素如何地依序去影響人們的態度、偏好與行為；不錯，這類研究方法的確確證了局外觀察者對地景知覺所產生的工具意義，這種實證主義的認識論性格，迎合了所謂環境評估系統的操作要件。然而，不可諱言地，他們卻簡化了主體做為人存在的經驗，集體使用與改變地景行動深處關乎整體性的範疇，可說是完全割裂了人與地景，割裂了地景中人們與其社會歷史的連結關係。

在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下，傑·愛坡頓(Jay Appleton, 1975)的努力是另一種經過修飾的解釋。鑒於被異化的地景知覺與理論的貧乏，英國人文地理學者愛坡頓首先重新來省察地景的美學品質，直接質問：“吾人究竟喜歡地景的什麼？為什麼我們會喜歡它呢？”他企圖去尋找一種審美哲學，不但能從一般抽象概念的角度，建立一個

地景知覺的理論基礎，而且亦可在實踐應用的層次，進行地景分析比較的研究；他用Habitat Theory與Prospect-Refuge Theory這兩個假設，分別處理吾人對適合生物生存之環境條件的愉悅反應，與解釋此種令人喜愛讚美的反應，極力為有意識的主體與可見的自然環境景緻之間感情連續的本質與源起做理論上的辯護。進一步而言，愛坡頓論述的疑旨乃在於探索美好的地景經驗與生物求生存本能之間存在一種對應平行的和諧關係。在概念上，其人類的地景經驗是預設在個體對個別的自然景緻之直接反應經驗與知覺的基礎上，美好地景產生的愉悅感，係源於觀察者體驗到一個環境，極能適合其生物性需求的滿足感，故而策略上將此類地景評估成為“潛性的棲息地”(Potential Habitats)。

但問題是人們與外在世界的感情連結，根本不可能只是個體或單獨個別的事件，而是關乎社會的意義，對生活於地景中的存在主體而言，主體與客體之間不宜做靜態而機械的分界，他們與外在世界的審美關係，需要進一步探索其歷史文化累積的審美傳統與人類集體求生存的自然基礎，所以當愛坡頓將地景經驗視為一個局外個體感知的存在時，必然地會遺落局內主體參與的共同經驗，尤其是愛坡頓亦從實用的觀點去分析地景的形式結構，著力於討論戶外視景之構圖表現方式。這樣的處理做法只是更無法說服吾人相信他對形式表徵下的深層意義和象徵的詮釋，究竟與他原先提出的兩種假說有何內在的關聯！總而言之，愛坡頓的地景知覺理論不過是十八世紀英國主觀唯心論傳統下的審美心理哲學重新披掛上陣。其最明顯的一個特點就是感覺主義，客體化的地景在此只是外在主體感覺的複合或組合，地景形式的審美價值，總是取決於個體感性經驗的範圍內，地景審美經驗與生物求生存間的因果詮釋觀念，均無關乎具體實踐的過程與社會整體的行動意義。因此，與其說愛坡頓開拓了地景知覺的理論研究，倒不如看成他的理論為前述的地景知覺研究下了一個註腳。

其次是人文地理學界的地景研究。從十九世紀的地理學建制化成為當代學院的論述以來，地景一詞就是地理學文獻裡經常出現的一個重要術語，但長期受到科學主義的客觀及理性的支配，地景在地理學界始終被當作一個靜態的、科學探討所決定的客體，像是三〇至五〇年代期間流行的形態學方法(Morphology Method)，被認為可以客觀地確認、分類與度量地景的構成要素以及處理其元素間形式組合的關係。六〇年代，實證主義的地理學甚至基於客觀和理性分析的旨趣，完全排斥感性參與的主體性(Subjectivity)(James, 1972)。直到七〇年代，實證主義的觀點才逐漸地受新人文主義地學思潮的挑戰(Tuan, 1971; Gregory, 1978; Ley & Samuels, 1978)。關乎地景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大體上均朝向主體性的重建，

試圖以一種人文取向去理解人及其生活世界的感性關係。譬如段義甫(Tuan, p.265)替人文主義地理學辯論：“藉著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這些有關空間與地點的地理行為，感情與觀念，吾人才能理解人文的世界。”

但是在對地景觀點的預設與研究方法上，英美兩地學術傳統的差異，從葛德與伯吉斯(Gold & Burgess, 1982)曼寧(Meining, 1978)，傑克生(Jackson, 1970, 1980, 1984)及雷佛(Relph, 1976, 1981)等論文邏輯可以看到其在風格與焦點上的一些差異。

在英國由於豐碩的歷史地景遺產，學界對地景的研究可謂既早又雜，以愛坡頓為首，成員來自英美各大學所組成的地景研究團體(Landscape Research Group, 簡稱LRG)，或許就是當今世界唯一從各種觀點研究地景的組織(Penning-Rowsell & Lowenthal, 1986)。不過，1978年英國地理學家協會(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在胡爾大學(Hull University)舉辦年會，並以“賦有價值的環境”(Valued Environments)做為研討會主題，集中討論個人及團體生活中地點及地景的意義；由於研討論文作者清一色為英國年輕一輩的地理學者，故葛德與伯吉斯(1982)的論文選輯足堪代表對新生代地理思潮在地景研究與理論發展的標竿。

主編使用“賦有價值的環境”這麼一個深具想像力的標題替代場所及地景，一方面可以避開傳統不同學域，像是環境心理學、社會地理學、地景分析與評估……等可能造成的先入之見，另一方面則可強調人與其所創造、居住、操控、保存、尋訪甚至想像的環境之間的感情連繫，說明他們重視各種實質地景及地點中人們的主觀經驗、意義與價值的探索。

在研究方法及技巧上，葛德與伯吉斯(1982: 3-4)開始就質疑往昔常用的行為及社會科學調查法，譬如：問卷、量表測驗、地景調查分析、照片模擬反應……等無法有效地表達與傳譯人們的地點感，故而建議利用文學材料的詮釋、史料的解釋佐證、對話、訪談、問卷數據、學院式的討論激盪等方式，來展現各式各樣的地點經驗及意義；因此，論文邏輯中有布爾·古迪(Brian Goredy)著重地點感覺品質的傳譯方法策略；有賈桂林·伯吉斯(Gacuellin Burgess)對以往電視評論員視覺解說方式的反省後，所提供另一種解說記錄模式的經驗心得，有大衛·勞思索(David Lowenthal)藉助文學材料勾勒重訪地點的經驗。在地景價值與權力實踐的關係討論方面，梅林·蕭德(Marion Shoard)從人文的角度側寫五位荒地保育者的觀點及其精英品味，是如何地影響形成全國性保育政策的取向，進而表白英國荒地景觀之獨特魅力的謎底；史第芬·丹尼斯(Stephin Daniels)及韓福瑞·雷帕(Humphrey Repton)的作品來討論英國喬治亞

時代美學價值與道德寓意的關係，以及如何地連結到地景庭園的實踐。然而，綜括全輯以約翰·龐特（John V. Punter）的“地景美學：綜合與批評”一文較具有理論發展的企圖，他批評傳統地景美學的唯心獨斷，欠缺嚴謹的社會哲學基礎，在綜合建議時指陳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不但能將地景美學當成爲不可分解的社會生活經驗及價值的一部份，辯證地關聯到經濟、社會、技術或文化的脈絡，使能在一個周延的分析架構下討論地景形式與生產關係，同時亦可以提供一個批判性的知識立場，來檢驗現有各種地景研究方法的理論預設與缺失。此文似乎已經隱然在暗示過去地景詮釋（Landscape Interpretation）的理論發展，在八十年代由唯物主義所提供的另一個新選擇。

總之，除了龐特的論文以外，葛德與伯吉斯（1982）主編的論文輯中所謂的“賦有價值的環境”其實是一種主體心靈建構起來的實在，外在世界是存在於人類主體意識的觀察與表徵之上。重視客觀的證據，而其中的秩序則是人類做爲一個能動的存在，以人的精神價值所決定出來的地景，本質上仍然未脫唯心論的陰影，同時，從其重視對細緻深入經驗材料的掌握，也可以看出英國傳統比較重視經驗取向的研究，於是取得這些主觀存在的經驗訊息，就變成他們極度關切的主題。

相對地，曼寧（1979）主編的論文選輯所訴求的地景概念，主要是界定在普遍一般人們日常生活周遭所感受見到的連續表面，亦即其所謂的「平常地景」（Ordinary Landscape）。這其實是說明了七〇年代美國新人文主義的地理學界在地景研究上的一種共識，他們認爲「地景」是複雜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歷經長時間運作塑造而成的產物（Relph, 1976）；只是這些基底卻是無意識地被塑造出來，甚至到了後來連所有參與創造的人們本身都無法察知。這樣的研究方法中，地景研究就是去了解一般人們日常生活的社會史的一個夥伴，因此曼寧（1979）的論文作者基本上是把地景當作象徵，是文化價值，社會行爲與個人行動在特定地方長期運作的綜合表現。每一種地景既是一種積累的結果，同時也是一種符碼；而研究地景旨在於對日常社會生活與文化意涵的意義加以解讀（Meining, 1979, p.6）。

事實上，這樣的地景觀念在美國地理學術的傳統上，原本就有一個重要的傳統，那就是傑克生（J.B. Jackson）的著作及其創辦的地景期刊（Landscape Journal）的編輯政策。對傑克生而言，他一直拒絕把地景當作一個形式的術語，處理成爲風景式或生態式的實體，而是視地景爲一政治性或文化性的現象，並且在其歷史過程中不斷地變化。曼寧（1979：228—229）就綜括傑克生的出版品與手稿指出其地景觀念的特徵：地景固著於人類生活之上，它不是被人們觀看而是落居的地點；地景是人與環境

的一種結合統一，反對人與自然之間雙元對立的像差（Aberration）觀念；地景對其上的居住者而言，乃是一個生活與工作的地點；更廣義地說，所有的地景都是象徵性，他們表達了某些天國意象遍佈在地球上的持續欲望；因此不可避免地，地景是不斷地在進行改變，因爲地景本身就是社會的反映，而吾人就是經由時間而創造社會的地景。同時亦列出傑克生認爲是地景研究核心的兩個結構性要素：個人的住所和鄉土地景。實際上，傑克生的地景學識在本質上是有民粹主義取向與民主化的特色，任何人只要具備敏銳的想像力、感受力與嫺熟社會生活的文化想像，其實每個人都能如傑克生一樣，不但能感知與溝通地景的日常意涵與使用，而且亦能指出地景創造者自我表現的世界觀。

但是面對當代的美國地景，哈維（Harvey, 1985）認爲傑克生那根深蒂固的唯心論，逃避了當代知識界，例如：波特萊爾（Baudelaire），班傑明（Walter Benjamin），伯曼（Marshall Berman）等對現代性（modernity）意義的討論。哈維長久以來一直認爲資本主義受到其積累渴望的逼迫，在歷史的某一時刻會以其自己的意象去創造地景，爾後又會爲進一步的資本積累而摧毀它。欲理解當代的地景，就必須掌握住這個“創造性的毀滅”的隱喻。哈維認爲傑克生的地景就是太有選擇性，一直只注視住宅社區或未工業化的鄉村地景，所以當他面對像是迪斯耐樂園或者是每個現代化的都市更新計劃時，仍自我意識地將地景隱喻成活動舞台的場景（Theatrical Spectacle），反而忽略此背景幕已不再是自然形成，而是人爲創造的第二個自然。不錯，隱喻是仍在，但是它的脈絡與意義卻已經歷史地改變了。所以，哈維認爲傑克生的地景思想與眼光註定他既是一位無望的浪漫唯心論者，亦是頑固的機械唯物主義者，他的浪漫與烏托邦主義，是從前門出去，又馬上從後門進來。是充滿著啓發，亦是充斥著無奈。

另外，從學術理論及方法規範來看，儘管傑克生一再地躲開學域分科的標籤，把地景當作是思想家的字彙，不斷借助小品文激發與解讀美國文化景觀的特徵與意涵，但是一般批評其論證缺乏知識必備的超然立場，就如曼寧（1979 p.229）批評他的說法：

“全都是斷言與辯論，缺乏任何記錄或正式展現的東西；很多是觀察得到的，但沒有任何的測量評價。傑克生是一位具有激發性的思想家，卻不是一位道地的專業學者，他的文章絕對無法被一般的研究機器支持。”

針對理論及研究方法缺失的批評，在曼寧（1979）的論文選輯中其實就有瑪溫·山姆（Marwyn S. Samuels）的“地景的傳記”試圖去發展改進，他認知到主觀客觀認識地景的方式有關鍵性的理論意義，所以他企圖把主觀與客

觀的決定因素同時結合到其研究方法上。這個方法特別利用傳記來檢驗藝術及表現技巧上的人類創造力；據此，山姆可以說是堅持地景的作者身份（Authorship），地景對他言並非無關乎個人力量的無意識產物，而是真實的人們在特定脈絡下履行能力的結果，例如：他就認為紐約乃是羅列布寧兄弟（Roebing Brothers）、路易士·蘇利文（Loris Sullivan）、羅伯特·毛錫斯（Robert Moses）等大人物，及洛克菲勒（Rockefellers）與哈利門斯（Harrimans）等貴族家庭的集體創作，這羣人是在美國工業主義萌發中，一個變遷中的都市經濟基礎與進步運動的流行觀念中，塑造了紐約的地景現象。顯然地，山姆的解釋模式是有結合觀念論與唯物論的企圖，但他卻無知於整合這兩者在方法論及哲學上的矛盾。他將被創始的地景（Authored Landscapes）在概念上重新定義成印象（Impression）與表現（Expression）地景這兩個範疇，這樣的做法其實是一種逃避，它只是用變形的新定義來安置地景本身內在的矛盾對立，重新描述主體與客體，內在人與外在人之間的對立現象，而地景觀念中最原始的核心矛盾根本上還是沒有解決。

同樣是屬新人文主義地理學健將的雷佛（Relph, 1981）就沒有像山姆對社會向度的忽視，與採用自由意志的假設。因為雷佛深知地景觀念，科學方法的演化與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之間的連結，但是當他企圖將人文主義的地景觀念與笛卡爾科學主義的地景圖象表徵，結合成爲一個足以顯露當代經濟生產模式下地點異化的純粹知識範疇時，他卻有意拒絕了真實歷史社會中意識與行動之間的辯證關係，並未進一步去探究造成當代異化地景的真正力源，反而提出環境謙遜論（Environmental Humility）把自身安置在返回自我的道德反省。

總之，英美兩地人文主義的地景研究與理論方法，基本上是受到唯心論、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等哲學傳統的影響，不但重視主觀的詮釋，提供對人的一種了解，而且藉由人文意義與人本價值的表白，在實踐意涵上欲使生命本身更有意義。人文主義的訴求與其說是對抗科學理性主義，不如說是處於異化地景的一種掙扎，人文主義與科學理性主義彼此尋求一種新的平衡互補關係。只是在理論層次的嘗試，無論是訴諸存有論或倫理觀的重建，他們都沒有進到歷史的過程裡面。特別是在當代科技掛帥，商品文化至上的社會價值中，人文主義的訴求能否達成，除了默會致知之外，到底又有何現實的憑藉呢？

第三是專業史家的地景史論述。受到七十年代反省後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影響下，地景史論述也有了新的進展。從事地景史專業研究的學者並不多，起步亦晚，早期像是紐頓（Newton, 1970）、托貝（Tobey, 1973）與喬特衛克（Chadwick, 1966）等全都出身地景建築及城市

規劃專業背景，由於他們欠缺紮實的人文社會科學訓練，其地景史的論述疑旨主要是依循建築史專業中的形式主義研究方法（Formalist Approach），或從通史、或從斷代歷史的範疇，對所謂地景建築的範圍、興起轉折及重要歷史作品等做視覺分析。著眼於若干偉大或特殊的地景遺蹟及記錄，從而肯定地景建築成爲一個專業和獨立的學域。儘管他們也對歷史社會的背景做脈絡的鋪陳，但在理論層次卻缺乏進一步的貢獻，他們通常只看見地景形式的特徵，並用有關自然風景的浪漫聯想詮釋其意義，將地景形式的概念範疇侷限在可操控的開放空間上面，完全符合地景建築專業論述的涵義（Connotation）。

即使是後來稍帶有人文主義色彩的喬佛烈與蘇珊（Geoffrey & Susan, 1975），相對於前者，其疑旨只不過是更寬廣和抽象了些，他倆特別從史後開展到史前來處理地景與人類文明之間的發展關係，質疑當今看似複雜又混亂的地景外貌，在人類漫長的文明發展過程中，是否隱藏某些沿續的意念或法則，並且可以用來解釋其表徵。在概念上強調人類異於萬物的精神意志創造了所謂的文明，並以一個外在於人類歷史社會存在的超人立場，界定表現人類生存之微宇宙（Microsom）與鉅宇宙（MacroSom）這兩個層次的觀念的地景形式範疇，總括其論述，它預設了人類文明中的地景形塑乃源起於神話，根植於以人爲自然宇宙之核心的自然哲學觀的人文主義。他們的論述不但未替土地資本的利益發言，而且看到當代地景形式的矯飾與虛偽，感到現代人面對自然生態被掠奪剝削時的無奈和無能，於是鄉愁地寄寓人文主義在人類的意志和觀念裡的重建，以重返天人合一的地景烏托邦。

在美國，由於佛萊德瑞克·勞爾·歐姆斯提德（Frederick Law Olmsted, 1822—1903）是綜合性的環境規劃與設計的重要歷史人物。更是美國地景建築專業的奠基者，所以始終倍受引述。例如費茵（Fein, 1972）就利用歐姆斯提德的作品圖照與相關歷史文獻、檔案資料，闡釋他的環境規劃及設計理論，進而將他連繫到美國文明在環境觀上的創見及成就；就研究方法言，仍爲形式主義，缺乏理論基礎來連繫作品形式及作者價值的關係。倒是菲雪（Fisher, 1976—1986）透過歐姆斯提德作品背後的哲學理念，重新詮釋他爲一位社會改革者，將當時歐姆斯提德提出的地景觀念連繫上美國都市改革的議程，從而肯定其在美國環境規劃設計史上的先驅地位。根據此論述，歐姆斯提德的思想本質是德國浪漫主義的唯心論，特別是受到謝林（Schelling）的影響而重視個體天生的價值與創造力，加上 Thomas Carlyle,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及 John Ruskin 等英倫的新實用主義傳統而強調美學的道德與社會功能，允諾藝術去改造社會，最後結合美國北方的洋基傳統而得以形成。他不但具有清教徒特有的強烈使

命感，而且充滿樂觀的信念，本質上他不是一位反都市主義者，他體認到都市化及工業化的不良影響，但卻相信這只是美國新文明的一個過渡階段，只要以公園做為補償性的自然概念，溶入城市實質結構，必能產生一個嶄新而高度有機的都市環境。總之，菲雪的疑旨是圍繞在當時歐陸文學哲學作品如何地影響歐姆斯提德思想的關連，以及在他的作品中又是採取何樣的美學形式來回應歐姆斯提德價值觀念？他從歐姆斯提德的思想哲學清楚地指出現代環境規劃設計專業原本強烈的社會改革理念的源頭，此一道德取向的論述在地景建築歷史論述中是相當獨特的。

然而，這種道德訴求的論述放在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進程來檢驗，歐姆斯提德扮演的社會角色究竟為何？其倡導的公園及保育運動真正又是為了什麼而又如何形成？顯然是缺乏令人滿意的答案。不過，在批判的都市計劃歷史論述裡，義大利威尼斯學者的達珂（Dal Co，1973 1979）曾經從美國進步傳統的思想淵源證論這股反都市的思想態度如何具體地被建構成為改革城市的形式？與分析歐姆斯提德的作品及1920年代的區域主義（Regionalism）等浪漫田園風神話背後的意識形態，達珂認為進步傳統（Progressive Tradition）改革城市形式的意識形態在於發展一套環境與都市化過程的有機關係，是回歸自然本質的浪漫之旅，但那是一種布爾喬亞的永恆心靈，他們均是不斷地在追求一個以倫理取代政治的詮釋者，其唯一的貢獻是替美國新文明尋求一個烏托邦，不過這卻成為其無法超越的門檻，因為那是在一個獨裁的知識遺產的鞏固基礎下，建構起來的價值世界，他們認為時代的演替將溶入到一個朝向“完美平衡”的烏托邦的連續演化之中。因此，公園、保育運動、公司城、美國區域規劃協會等城市改革的形式，其實是一種感性觀看世界的方式，自然無法洞悉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支配性意識形態地建構起來的新社會關係。

用達珂的批判歷史論述來檢視菲雪（1987/1986）的道德取向的論述，歐姆斯提德的價值立場顯然不是倫理而是政治的；就社會改革的立場言，亦非中立而是保守的。（Blodgett，1976）這種說法進一步參考佛格烈松（Foglesong，1986）對美國殖民時期到1920年代的資本主義城市規劃史的研究，就可看得更清楚；在理論層次上，佛格烈松借用尼可斯·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國家（State）概念質問兩個議題：一、規劃師究竟是以何種方式立足於資本與國家的關係之中？二、都市規劃的發展是如何地因應資本利益而成為政策形成的一種方法呢？換言之，此論述疑旨在於理解資本主義的發展如何產生與壓抑對都市規劃的需求？佛格烈松根據「財產權」與「資本家—民主」這兩個結構生矛盾，分析1850年代紐約中央公園的形成及建造完後的公園運動，特別是歐姆斯

提德的公園規劃及倡議，認為這些其實都是統治階級的住宅改革失敗後，改以公園改革運動在都市勞工階級的住家與工作領域來改善外部環境，一方面做為彌補勞工生活環境體驗到的衰敗與被剝削的權宜做法，另外一方面則利於產業資本積累所需的勞動力再生產。同時，十九世紀倡議產生的公園委員會之能得到對民衆控制方面的授權，則是土地資本的政治支持者體認到有限的社會控制對公園相鄰地產價值的穩定與富人生活安全的保障有所益處使然，從此角度來看，歐姆斯提德等人在無意之中成為土地資本獲利的間接代言人。總之，近代公園概念的出現，其實是土地資本利益的需要，與產業資本需要一種特殊形式的地景來紓解都市勞工的壓力與不滿使然。

從規劃史的觀點來看，公園的出現除具有意識形態效果，及作為土地與產業資本利益的伴隨副產物以外，不可否認地，像公園這類特殊形式的地景誕生之後，就一直被公認為一種制度化的都市服務與設施，是集體消費元素的一種。然而，公園的意義範疇，隨著歷史社會的組織脈絡變遷而有何轉化？美國建築社會學家葛蕾芝（Cranz，1982）就用韋伯社會學的歷史因果模型為理論架構，將美國都市公園運動史先劃分成四個階段，而後分析票面價值瓦解之下的社會意識，她指陳美國公園運動其實就是同時代的社會改革運動的支脈之一，它呈現了各種社會意識潮流的演變，反映了市民社會的秀異份子基於公共福祉與社會正義，為控制及改革都市社會的問題，如何地運作權利與權力去支配公共財的持續議程。由於葛蕾芝的論述迴避了此社會運動的物質基礎，沒有從社會構造的矛盾衝突再看到改變中的生產方式與社會關係，而只是據守韋伯的倫理中立，處理美國民主政治體下各種社會精英，利益團體與機構的集體意識，並且不知覺中以這些社羣的主觀意識去建構歷史社會脈絡與公園角色轉化之間的因果關聯。所以，此論述中公園運動背後的意識形態，其實只是呼應現實權力結構中某一位置的那些意識形態模式；吾人所看到的制度化之特殊地景形式，它的價值是在既有的社會體系中，執行特定的社會控制功能，並且強化那個社會建制的合法化基礎，然而葛蕾芝始終卻沒有釐清仲介者行動背後真正的動機，所關乎的現實利益與需要究竟是什麼？

總之，葛蕾芝的論述在理論層次也提供地景史專業一個新的選擇，但她所選擇的理論意識形態，將真理的唯一判準所構成的實踐，設想成由人們自由而審慎的行動所構成的實踐，此認識論的障礙其實是說明了她的限制所在。

最後，關於地景的意識形態詮釋。除前述把地景當作營造形式處理的專業歷史論述以外，在英語世界中所謂文化分析與文藝理論陣線上，從七〇年代起也有少數人開始重新詮釋文藝作品中地景意象的社會意涵（有名者如：

Barrell, 1872; Williams, 1973; Turner, 1979), 更具體地說, 他們著眼於地景表徵的意識形態批判, 此中最有名者當屬威廉士(Williams, 1973)的“鄉村與城市”, 他避開純粹個人化的審美觀點: 鑑賞, 而把地景當作是經由文藝遺產長期集體社會化的一個意象, 他不但引導吾人重新去解釋地景, 著力於探索地景美質下面的道德意義與社會現實, 而且指陳英國傳統上對鄉村田園的浪漫情懷, 對鄉村與城市的各種觀念及聯想, 其實是鄉村資本主義與產業革命散佈的形上結果, 是一漫長的歷史過程。

事實上, 人們之所以讚美鄉村卻責難城市, 是因為地主的傲慢無禮與農民的悲慘處境在文學中的鄉村景緻上未曾留下痕跡, 剝削與壓榨完全溶進到井然有序, 天真無邪的地景外觀裡, 文學中的地景表徵其實是地產所有人的一種表現, 此外, 威廉士亦一再論證英國鄉野發展史的問題關鍵, 就在土地財產權的壟斷上面。因此, 儘管十八世紀的仕紳淑女的審美與人文感性是那般的高雅精緻, 但他們卻視若無睹於土地上辛勤賣力的農民與工人生活的貧困, 這在說明浪漫田園文學反映的只是一種意象化意識形態(Imaged Ideology), 是上了一層瑣瑣質的世界。譬如: 在“愉悅的景緻”這一章裡, 開頭領脈就指出: “一個工作中的鄉村絕對不會是一種景緻, 地景唯一的觀念是隱涵著隔離與觀察的狀態。去追溯風景畫、風景著述、風景庭園及地景建築的內在歷史可能是有用處, 但是任何最終的分析, 吾人都必須將這些歷史關係到土地及社會的一般歷史。”(Williams, 1973: 119)

顯而易見, 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地景觀念是一種被隔離分開的某些東西, 並且特別地被標訂在特定的意義裡, 它絕對不僅是外觀, 而是有錢有權階級價值的一種表現。

用近來的文化理論的觀點把地景當作文化產物來看, 前述地景觀念其實是表現了物質世界中人類社會生活的塑造者意識及實質活動的一種介入, 用威廉士(1977/1978: 98-99)的話, 這是一種介入社會實在的積極過程, 而非藉經投射、偽裝或詮釋附加在社會實在的一種過程。這些過程的運作均是經由象徵符碼或語言, 而它們或多或少都是從過去發展而來, 學習得到, 並且特殊於文化生產仰靠的特別媒介, 所以這些符碼可說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實踐意識。這就是“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在“鄉村與城市”中, 威廉士就是以田園文學作品來闡明這個概念, 他舉出許多事實呈現「自然」普及於英國作家的感覺裡, 並且盛行好幾個世紀, 他們對地景觀念的扭曲, 大多數是受到文學論述實踐的影響, 而不是經由直接的經驗, 作家們其實是缺乏個人所有的農務勞動經驗。

至於吾人在概念上如何結合具體實踐與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 威廉士並沒有交待清楚, 因為其文化理論的哲學

基礎強調自然與生物性當作社會歷史的根基(Wolff, 1983: 95), 迴避了具體的社會構造、生產關係, 是故伊格頓(Eagleton, 1975)攻擊威廉士的文化模式帶有人文主義與經驗論的傾向; 此外, 部份的理由是我們都傾向於將來自吾人社會的文化象徵形式與物質基礎分開隔離, 然而觀諸當今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裡, 象徵生產主要是被安置在物質商品交換的生產的情形, 當人們無法釐清確知在自己的社會文化裡物質生產的象徵構造時, 威廉士的感覺結構倒是提供了一種連繫的觀點與線索!

如果更進一步把鄉村或城市擴大成“地景觀念”來界說, 那麼, 地景觀念的歷史不但源遠流長, 而且意義的變幅亦是前後相當不同的, 這樣一個鉅大的主題, 歷史地理學者克斯拉伯(Cosgrove, 1984)的“社會構造與象徵地景”總算在理論層次有新的回應。簡單地說, 此書目的在探討西方文藝復興以來, 地景觀念作為一文化概念的源起與發展。克斯拉伯的論證是說地景觀念代表著一種“看的方式”, 是某些歐洲人曾用來再現自我與其和世界之間關係, 並且藉此而支配社會關係的某些方式。這種看的方式有它自己的歷史, 但卻只是一個更寬廣的社會經濟史的一部份; 它有其假設與結果, 但是這些假設與結果的源起和意涵卻超出對土地的使用和知覺之外; 它有自己的表現技術, 但是這些技術是與其他文化實踐的領域共享著。在歐洲社會演進的過程中, 地景觀念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裡, 曾經被歐洲精英意識加以精鍊與細緻化, 它表達與支持一系列的政治、社會與道德假設, 而且被接納當成有意義的品味, 直到十九世紀晚期, 在一個鉅大的變遷下, 才完全改觀; 如今, 地景只是淪為科學研究、土地規劃與個人享樂的一個範疇, 在一個非常活絡的文化演替時期裡, 它已經不再負載任何社會或道德的意涵。

為具體處理地景與文化的理論關係, 克斯拉伯引用現代有關於文化生產與物質實踐之間關係的理論, 將地景觀念當做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 人類意識與文化的產物, 並且安置在資本主義轉換的架構裡詮釋。換言之他並不相信像地景觀念這樣的一個文化概念, 可以自發地從個人心靈及人類羣體中產生, 相反地, 它是處在一個生產人類關係的真實歷史世界的脈絡內, 透過人類集體意識的實踐形成; 同時, 他也指出地景觀念的物質基礎, 就是人類對土地的利用, 亦即社會與土地的關係。因此, 克斯拉伯論述的疑旨主要就是將有關“地景的文化意涵”的觀念關聯到“土地物質地被利用與剝削”的方式上, 進而辯證地探究地景作為一文化產物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至於發展脈絡的理論; 則採行馬克斯主義對資本主義轉換的解釋模式, 以便對特定的歷史社會裡的地景觀念做理論性的解釋。在如此的理論建構下, 地景觀念轉化裡所隱涵的歷史過程模式, 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的心態(Mentality)以各種複雜的方式中

介於前資本主義想法的進程。更清楚地說，就是以下節錄的意思：

“在一個自然經濟裡，人類與土地間的關係，主要是內在人(Insider)的關係，是奠基在使用價值與類比詮釋的一種未異化關係。在一個資本主義經濟裡，它則是介乎所有者與商品間的關係，是被異化的關係，在此人類位於局外，並且因果地詮釋自然。……地景觀念一直都在不穩定的統一上持有這兩種類型的關係……西方地景觀念的源起及其藝術表現，可說是部份一直用來在意識形態上促成財產關係的承認，同時也維持一個土地利用未被異化的意象。”

(Cosgrove,1984:66)

在經驗研究部份，克斯拉伯從中古時期的地圖繪製，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城鄉規劃設計，十七世紀荷蘭的風景畫風，十八世紀英國的風景式庭園，美國建制初期的聚落規劃，以至二十世紀的英美城鄉規劃等舉例論證，暴露不同時期的不同地區的地景觀念當作一文化產物的意識形態。

但是，由於他舉證的地景觀念所涉及的時空背景與文化基底甚為寬廣，在不同的個案經驗分析中，並沒有對不同文化基底的地景意涵提出理論性的詮釋，換言之，克斯拉伯論證的重點是重建不同地景觀念的組織脈絡的理論架構，而不是針對地景的文化意涵提出一套更細緻的詮釋理論，因此與其說是他忽略地景觀念的象徵構成，不如說他只是直接分析不同的地景觀念對不同的社會構造究竟是如何地發揮意識形態的效果。

事實上，克斯拉伯所面對的是“文化特殊性”的認識問題而文化特殊性之所以會存在，是說在相對自主的結構裡，制度和表意實踐會構成此特殊性，並且經由它們再表徵現實與意識形態(Wolff,1983)。可是，當吾人面對現代資本主義逐漸擴散為一個超大自主的結構時，克斯拉伯對文化特殊性的有意忽視，與其責難其理論的粗枝大葉，不如體諒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當代地景研究與理論發展的水平在他的拓荒基礎下，仍有待繼續深化。

參考文獻

- Appleton,Jay
1975,1977,1978 Th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 London:John Wiley & Sons.
- Barrell,J.
1972 The Idea of Landscape and the Sence of Place 1730—1840:An Approach to the Poetry of John Clare,Cambridge,Ma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odgett,G.
1976 "Frederick Law Olmsted: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Conservation Reform",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62(4):869—889.
- Chadwich,G.F.
1966 The Park and the Town:Public Landscape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London:Architectural Press.
- Cosgrove,Denis.E.
1984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London:Croom Helm.
- Cranz,Galen.
1982 The Politics of Park Design:A History of Urban Parks in American,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
- Dal Co,Francesco.
1973,1979 "From Parks to the Region:Progressive Ideology and the Reform of the American City",in The American City:Form the Civil War to the New Deal. ed.Cincci,Dal Co,Manieri—Elia & Tafuri,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
- Eagleton,Terry.
1975 Criticism and Ideology,London:New Left Books.
- Elsner,G. & Smaydom,R.C.
1979 Our National Landscape:A Conference on Applied Technigues for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of the Visual Resource,U.S.For Serv.,Pacific Southwest For.Range.Exp.Stn, Berkeley,CA.
- Fein,Albert.
1972 Frederick Law Olmsted and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Tradition,New York:George Braziller.
- Fisher,Irving.D.
1976,1986 Frederick Law Olmsted and the City Planning Movement in United States, UMI Research Press,Ann Arbor,MI.
- Foglesong,Richard.E.
1986 Planning the Capitalist City:The Colonial Era to the 1920s,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eoffrey & Susan Jellicoe.
1975 The Landscape of Man : Shaping the Envi

- ronment from Perhistor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 Thames & Hudson.
- Gold, John. R. & Jacquelin, Burgess., ed.
1982 Valued Environment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Gregory, D.
1978 Ideology, Science and Human Geography,
London: Hutchinson.
- Harvey, David.
1986 "The Essential and Vernacular Landscape",
Design Book Review. 10(Fall): 13-17.
- Jackson, J.B.
1970 Landscapes: Selected Writings of J.B. Jack-
son, Amherst, Mass: University of Mas-
sachusetts Press.
1980 The Necessity for Ruins and Other Essay,
Amherst, Mass: University of Mas-
sachusetts.
1984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James, Preston. E.
1972 All Possible Worlds: A History of Geogra-
phical Ideas, New York: Odyssey Press.
- Ley, D. & Samuels, M., ed.
1978 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
lems, London: Croom Helm.
- Meining, D.W., ed.
1979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Geographical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wton, N.T.
1970 Design On the L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elph, Edward.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Li-
mited.
1981 Rational Landscapes and Humanistic
Geography London: Croom Helm.
- Scott, Allen. J.
1982 "The Meaning and Social Origins of Dis-
course on the Spatial Foundations of Soci-
ety", in A Search for Common Goun, ed.
- Gould, Peter. & Gunnar Olsson, London:
Pion Limited.
- Tobey, G.B.
1973 A Hist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
Relationship of People to Environment, New
York: Elsevier Publishing.
- Tuan, Yi-Fu
1971 "Geography, Phenom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Canadian Geographer. 15(3):
181-192.
1976 "Humanistic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6(2):
265-276.
- Turner, J.G.
1979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Rural Scenery
and Society in English Poetry, 1630 - 166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U.S.D.A., Forest Service.
1973 - 1980 National Forest Landscape Manage-
ment, 1,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 U.S.D.I., 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
1980 Visual Resource Management Program,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Williams, Raymond.
1973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1978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lff, Janet.
1983 Aesthetics and the Sociology of Art, Lon-
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Zube, E.H.
1980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Perception and
Public Policy,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ube, E.H., Brush, R.O. & Fabos, J. Gy., ed.
1975 Landscape Assessment: Values, Perceptions
and Resources, Stroudsbure, P.A. Dowden,
Hutchinson & Ross.
- Zube, E.H., Sell, J.L., & Taylor, J.G.
1982 "Landscape Perception: Research, Applica-
tion and Theory", Landscape Planning, 9: 1
-33.